

# 人類學並不總是那麼懷舊<sup>#</sup>

## ——從《鄰里東京》看都市人類學的初興

孫晨光

【內容摘要】《鄰里東京》作為都市人類學的代表作，首次對當代日本都市鄰里的內在動力與社會結構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貝斯特通過對宮本町社區的參與式觀察，反駁了三種當時學界頗為流行的關於日本城市鄰里相互關聯的研究傳統，並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觀點：城市鄰里既非鄉村的延續，也不是政府強加推動的行政單位，而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居民自願形成並行之有效的一種文化形式。筆者在文章最後結合對本書的感悟，認為都市人類學正在進行從傳統學術話語向城市社區語境過渡的重要任務，它也是找回失落社區的有效途徑。

【關鍵字】鄰里東京，都市人類學，城市社區，建構，人際互動網路

（《鄰里東京》（*Neighborhood Tokyo*）【美】希歐多爾 C 貝斯特著，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 年版）

貝斯特通過對這個如園林般精緻的鄰里社區的見微知著的深描，讓我們得以窺見整個東京都市的運作與變遷。與傳統人類學所關注的異文化與鄉土社會的主題相比，都市文明同樣是一種社會組織，而且也有被解剖與分析的必要性。本書首次對當代日本都市鄰里的內在動力與社會結構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從而消除了人們對戰後日本社會和文化的原有成見，並因此於 1990 年榮獲美國

---

# 文章作者於博士研究期間受到「香港政府博士津貼計劃」(HKPFS)的全程資助，本文亦為香港城市大學亞洲與國際學系「中國城市社區現代化、低碳化轉型研究」的一部份。

社會學學會「都市與社區研究」大獎。

在最初進行田野工作的時候，作者還是東京都立大學社會學系的一名研究生。貝斯特 1979 年開始在宮本町 0.071 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居住了整整兩年，又於 1983 年、1984 年和 1986 年再次前往。經歷一番如此深入、細緻的實地調查，方才成就了這部當代都市人類學研究的典範之作。

## 一、本書的行文結構

本書的結構看似平鋪直敘，從宮本町的發展概述談到這個社區的政治特點、鄰里活動、參與群體結構，最後又着重探討了節日與社會秩序的主題，特別是在結論部份中篇幅頗多地觀照了老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及其變遷前景，此處不免使人產生閱讀上的困惑——尤其感覺對於老中產階級的敘述略有冗餘，似游離於主題之外。不過，當再次回味整體敘述與弦外之音時，才猛然發現其實全書行文遵循着較為嚴密的邏輯體系，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將作者的研究目標、理論假設與田野工作介入有機地結合起來。

首先，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東京大大小小的鄰里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它們是城市景觀中具有社會意義的分類單位。鄰里中內在交織、相互重疊的社會組織和機構為當地的社會生活提供了完備持久的結構，「居民之間不僅可以通過本地的組織，也可以通過非正式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網路相互發生聯繫」<sup>1</sup>。此外，引起貝斯特強烈的田野調查興趣的是多爾（R.P.Dore）在 1958 年出版的《日本城市生活：關於東京一個行政區的研究》一書，因為書中描述的「鄰里社會生活模式在 30 年之後的東京依然普遍存在」<sup>2</sup>，而對於東京及其他大城市的社區與生活的微觀結構卻「令人驚訝」地關注很少。筆者認為，這為整部書奠定了視野與理論的基調——貝斯特描繪的宮本町社會生活，並分析內在和外在於鄰里的力量，其目的在於這些力量創造和維繫的結構如何使當地的社區生活「生生不息、經久不衰」。

一個更宏觀的問題就此浮出水面：一個鄰里社區如何與城市更大的宏觀環境進行互動，並被後者所形塑。

其次，作者對於以下三種關於日本城市鄰里的相互關聯的研究觀點進行了反駁：

第一種觀點認為，東京不過只是一系列鄉村的集合，即強調前工業時代的鄉村生活與當今的城市鄰里生活之間具有直接的歷史延續性。

第二種觀點認為，城市鄰里只不過是一個行政的或者政治的術語。這有時也會分異出一些分論點。譬如，有的分論點持有者堅信，如果不同層級的政府、行政組織沒有對日常生活的結構施加影響，那麼鄰里在城市的社會版圖中將不會是一個明確可以識別的區劃。另一種分論點則稱，鄰里只不過是出於在地域上界分政治機構的考慮才有存在的必要。

第三種觀點認為，傳統城市鄰里生活的穩定性是老中產階級（包括個體商人、小工廠主和手工業者等）生活方式的表現。由於相對獨立，老中產階級的成員就有可能維持一種守舊而過時的生活方式。該論點的關鍵元素即在於，一種更應屬於鄉村社會而不是工業城市生產方式的社區組織被不合時宜地保留了下來。

因此，作者通過數年的參與觀察力求論證：

第一，城市鄰里不是鄉村社區，它們不是即將消失的社會形式的殘留。作者在書中多次強調基層社區與城市之間的互動相關，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城市社會表面上的穩定。在他看來，把城市視為地理上緊密相連的鄉村集合體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城市基層社區並非自給自足，而是一種彼此依賴的社會網路。因此，貝斯特的鄰里研究並非為了在「傳統」與「現代」的連續統中建立話語權，而是揭示「傳統」的建構本質與日本城市社區的真實變遷動力。

第二，鄰里也絕不僅僅是政治與行政的實體。如果只是以這種方式來想像，那必將忽視那些對城市鄰里居民來說有意義的社會關係和文化價值。對他們來說，城市鄰里就是社區。當地的社區機構之間共用社區價值和關於社區的認同，這賦予鄰里一種社會凝聚

力，如果沒有這些，鄰里就不能有效地實現其政治和行政目標。

第三，老中產階級在維持和創造城市鄰里的過程中的確發揮着核心的作用，但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受社會潮流的影響，而是他們對一種更大的社會環境的回應。他們對鄰里生活的保留是對當代日本社會結構的策略性回應，而並非他們孤立於社會潮流的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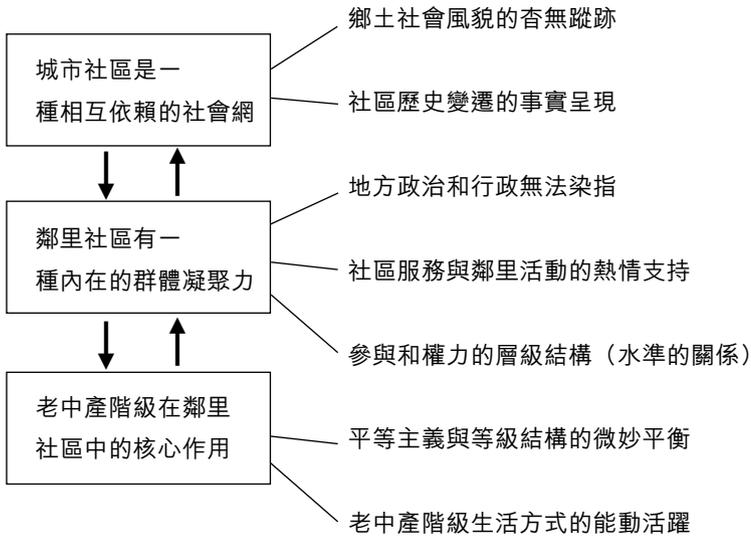
## 二、城市與鄉村的前世今生

為此，作者以章節序目的編排來依次對應上述自己的假設。在「宮本町概述」與「一個鄰里的發展」兩個章節中，他通過描述這個鄰里社區的歷史變遷與現實狀況來駁斥「（城市）不過只是一系列鄉村的集合」之論調。現代的宮本町完全呈現一派都市景象，鄉土社會的歲月已無跡可尋；而這個社區的歷史演變其實更具有動態性和自主性：宮本町在歷史上幾次更改邊界，其住民也有許多變化，宮本町的形成與東京的人口增長和城市擴張緊密相連。貝斯特在書中多次強調，縱然前工業時代的傳統力量仍然存在，但自現代以來發生的諸如關東大地震、二戰都對雲谷村（宮本町的前身）的變遷施加了重大影響。他通過實證說明了傳統社區和城市社區一樣，隨着時代變化，從自治、二戰的集中化、歷經改造，再到現代社會中與地方政府互動並如何建構起社區的認同感。同時他還提出傳統與傳統主義的區別，後者並非是對過去的反映，而是濫觴於當時日本社會的意識形態潮流，具有頗為濃厚的建構色彩，即傳統主義所要努力恢復的過去「是一個具有可塑性的理想，而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sup>3</sup>。

有關接下來的論述，貝斯特既是在論證他的第二個主論點，也是承接上述兩個章節的結論。他從「地方政治和行政」、「社區服務和鄰里活動」以及「參與和權力的正式層級結構」三個方面來回應「城市鄰里只不過是一個行政的或者政治的術語」的謬論。「鄰

里」基於但不局限於地理概念——宮本町擁有自己的「町會」，鄰里內部的居民只要繳納微薄的會費即可入會。町會在很大程度上是鄰里居民的自治組織，發起和管理諸如預防火災和犯罪、維持交通秩序、舉辦節慶活動、維護公共衛生等各種日常事務。町會內部也存在權力與派系鬥爭，不過大多數情況下都順利完成了自己的職能。而鄰里成員通過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中，不斷增強着自己的身份認同感和凝聚力。因此，戰後重組的日本居民自治組織——町會、町內會、自治會，雖然看上去其持續性是前工業社會的傳統主義的結果，實際上是相對於「過去」創造的一種當代的社會關係。另一方面，日本的地方政府為了控制居民組織，開展指導性活動時，不得不利用它們已經形成「傳統」的活動形式。當這種傳統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時，反過來又能夠與政府的權威抗衡。最明顯的事例，莫過於文章提到的當區政府和消防機構想要完全控制、指導消防預防工作的時候，居民組織的上上下下都表現出厭倦和不滿，來自政府的幹部也很快地察覺到這一不滿，收斂了他們對居民發號施令的企圖。

在本書的最後兩章「朋友和鄰居」、「節日和社會秩序」中，作者向我們揭示了鄰里是如何促進社區身份的——在這裏，平等主義與等級結構的原則達成了微妙的平衡，尤其是老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問題。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人們，可以感覺到他們這裏的地位與聲望，與在社會其他地方並不一致。那些先前老中產階級（商人、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的能力和人格權威在學歷社會中無法獲得認可，他們在這個鄰里社區——主流社會之外的領域裏得到一種均質化的認可補充，能夠以「不參加鄰里活動」為由將他人排除在外，因此緩解、平息了社會其他領域激烈的競爭，當然也可能增添了一項社會競爭。貝斯特把這種居民組織的存在視為階級格局得到調整和平衡的一種槓桿。他在結論部份進一步分析道：老中產階級是一個充滿生氣的龐大人群，在當代日本的社會分層和社會衝突中，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一個能動活躍的元素，而不是昔日時光的遺存（圖《鄰里東京》全書架構）。



綜上所述，貝斯特關注的是各種因素如何導致了社會生活模式的變化和發展，強調的不是人對歷史的被動接受，而是人對當前環境的回應。他認為，如果將社會變遷永遠看作是沿着「鄉村——都市」、「傳統——現代」的連續統簡單運動，將會歪曲人們對都市鄰里的理解。那些關於傳統主義民族精神的重新闡釋和操縱——認為當前的文化來自一個（非）歷史的過去——「經常掩蓋了日本社會生活的動力和流動性」<sup>4</sup>，之於傳統的操縱一下子成為了可能，並得以成功地遮蔽住城市社區變遷的內在實質。日本人並沒有在傳統 vs. 現代的二元價值系統中遭受精神分裂之苦，反而良好地適應了社會變遷。鄰里既不是政府強加推動的行政單位，也不是都市里的一個小村莊，而是城市發展過程中，一種居民自願形成並且行之有效的文化形式。

### 三、找回失落的城市社區

令筆者印象頗為深刻的是，作為人類學的田野研究者，貝斯特並不是一個保守的觀察家。他在宮本町生活的時候，與妻子一道積極參與社區文化活動，既向當地人展示了美國人活潑好動的民族性格，也為平鋪直敘的學術文本增添了一抹抹亮色。譬如，貝斯特參加了町會組織的冬日夜巡，他也像町會幹部一樣邊敲鈴鐺邊以拖長的低音喊道：「小心火燭！」他自信已將如此簡單的任務模仿得惟妙惟肖，不料第二天鄰里竟然有人察覺出防火警報與平日有別，一時傳為趣事。每年秋季節慶，町會都要組織各種遊行活動，周圍鄰里為競爭人氣絞盡腦汁。宮本町於 1980 年的遊行活動劍走偏鋒，貝斯特的紅髮妻子加入了婦女的舞蹈隊。她在準備階段可謂費盡周折，不過跳着日本民間舞蹈的異國女子卻也最終驚豔四鄰。

後現代主義常提及傳統與知識的建構問題，筆者認為《鄰里東京》這本書也在試圖向我們講述東京鄰里社區的傳統主義建構問題。在上一小節中已稍有提及，雖然鄰里自治組織的積極分子構成階層出現了變化，但是戰後町會的生命力、新的社區活動組織者的原動力並未改變，這大概是因為這種基層居民組織的團結情感和名義上以平等原則展開的活動，與社會其他等級制度、觀念相分離。E·霍布斯鮑曼在《傳統的發明》中指出，歷史上許多所謂的傳統，若真要考證起來，其實相對於歷史的長河來說，都只是具有很短暫歷史的傳統。傳統是創造的，是人為強化的，不一定具有悠久的歷史<sup>5</sup>。

簡·雅各斯 1961 年就從城市規劃學的角度指出，美國很多大城市的新城區在社區活力、安全性、歸屬感等方面遠不如老城區。在她看來，正在走向衰亡的不是街道狹窄、房屋低矮的老城區，恰恰是那些高樓林立的新城區。這兩者的一生一死，最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正是那種鄰里間通過長時期相互交往產生的網路狀結構<sup>6</sup>。在另一本社會學名著《街角社會》中，我們也可以得出類似的結論：一個社會相互作用程度高、彼此有着緊密依賴感的小型社區，比

一個鄰居間彼此孤立的現代高樓住宅區，更讓人有安全感和幸福感（雖然後者是從一個頗為灰暗的視角來審視這個主題，波士頓北區的越軌行為更多地吸引了讀者的眼球）。《鄰里東京》在這方面則更進一步，它不僅着眼於這種鄰里關係構成的網路本身，還關注它在一個長時段的社會變遷過程中如何實現順利過渡，以致最終達到動態平衡。我國從改革開放至今，相關的「題材」理應取之不竭，譬如全球化引致的流動性增加是否將加速社區失落<sup>7</sup>。然而傳統上中國學者更多關注農村社區，遭衝擊最大的城市社區研究反而相對空白。近年來，這種「付之闕如」逐漸被填補，比如本世紀初項飆曾在所著《跨越邊界的社區》中研究北京城鄉結合部的「浙江村」，他逐漸意識到城市社區猶如海洋上的一個個島嶼，表面上獨立，但在水面下卻是相互連接——所有社區的社會組成方式都能夠發生溝通與相互交錯<sup>8</sup>。

總之，這是一部兼具畫面感與立體性的人類學力作，它讓我們猛然發覺人類學並不總是那麼好古、懷舊。貝斯特曾說，多爾在 20 世紀 50 年代描繪的鄰里社會生活模式在 30 年之後的東京依然盛行。那麼，對中國讀者而言，貝斯特筆下的「鄰里東京」畫像，或許在 21 世紀初的今天依然沒有退去，這反而是我們的城市社區盡力去實現的目標與夢想——日本奇特的町會組織與鄰里關係，使當地居民自己解決了眾多日常問題，讓城市煥發出靈動的復興生機。中國的社區發展若能從中汲取經驗，也算是都市人類學在中國的實踐典範。充滿活力的社區人際網路也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宣言提供了一種實現路徑，而不是相反，因為僅僅擁有物質的增加與消費主義的大行其道並不會提高幸福指數，反倒會加劇人的異化與疏離感。筆者認為，《鄰里東京》對我們自身的意義即在於：它的真正關鍵字並非「東京」，而是「鄰里」。

## 參考文獻

1、2、4 (美) 希歐多爾 C 貝斯特：《鄰里東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 年版。

3 R.H.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World War Two. New York: Norton, 1978。

5 (英) E·霍布斯鮑曼：《傳統的發明》，譯林出版社 2004 年版。

6 (加) 簡·雅各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紀念版）》，譯林出版社 2006 年版。

7 孫晨光，王冰純：「社區的異化——全球化視野下的社區轉變」，《中國集體經濟》2010 年 6 月，第 18 期。

8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三聯書店 2000 年版。